

· 思路与方法学 ·

新实践、新概念与新学派

——谈中医理论研究的突破与发展

匡 调 元

当前,如何更快更好地促进我国医学科学的发展,开创一个新局面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本文就中医理论研究中,如何开展新实践、形成新概念、创立新学派,促进中医理论研究的突破和发展问题,讨论如下。

关于“新实践”

一切医学理论都来源于医学家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医学实践总结了规律性的资料而形成的。中国历代医家通过长期的临床诊疗工作对人的整体活动规律进行了深入的观察,提出过不少学说。那些医学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有历史的局限性,都只能是相对真理,其中有正确的见解,也难免杂有谬误的地方,是毫不奇怪的。但问题在于我们今天究竟以什么作为区别精华与糟粕的标准,是以“《内经》曰”、“仲景曰”为标准,还是以“selye 报道”、“巴甫洛夫指出”等等为标准。我们认为这些都不是标准,而只能是参考资料。判断正确与否的标准只能是人们的再实践,我们称此为“新实践”。凡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就继承;凡证明是错误的,就扬弃。应该有计划地用一代人的实践去检验过去的理论。特别是当人们对某些理论有争论的时期更需要这样做,要从以往在历史的局限性的束缚下所取得的医学理论体系中去觅取真理部分,为今天的医学科学服务,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推陈出新”。

我们所称的医学科学新实践主要包括临床观察及实验室研究两个方面。在此,我们要强调中医临床观察的重要性。因为中医学与西医学不全相同,中医学的全部基本理论,自《内经》开始直至其后的各家学说,都是从临床观察中得来的。因此,我们必须首先从临床实践中去检验这些理论是否正确。其次,人的整体的宏观的活动规律远远没有被人们所完全认识,必须从临床实践中去证实它,论证它。几千年来中医各家学说的形成与发展史表明,凭传统中医所习用的手段还是可以发展中医理论并形成新学说的。目前有

些忽视或轻视临床观察的倾向是错误的,不利于中医学术发展的。当然,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仅仅依靠传统方式的临床观察已经不能适应当前自然科学发展的形势,必须同时开展实验室研究。实验室研究所运用的手段是当今新的历史条件所提供的先进技术,是今人比古人优越之处,应该尽可能地加以利用。通过实验室研究必将提供单纯依靠临床观察所不能获得的资料。这原是自不待言的,但却还有少数人总想否定这一点,这是对现代科学发展总规律缺乏正确理解的表现。

对古代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如果仅仅是摘抄或简单地归类刊印,当然不能算新实践;如果在整理过程中能对人体生理或病理的内在规律提出新的见解、假说或设想等等逻辑性的东西,这种以可靠的间接经验材料为基础的,经过科学的抽象以后提出的新的概念,甚至新的理论,这种脑力劳动过程应认为是一种实践活动。其实,毫无直接经验的人只能人云亦云,是不可能正确取舍文献资料而发现什么新规律,提出什么真知灼见的。就目前医学科学研究的重点而言,新实践主要是深入细致的临床观察和立足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实验室研究。最理想的是两者同时并举。一部分同志是可以争取到这种条件的。只要我们进行新实践,必然能获得新资料,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新规律,为形成新概念提供第一手的感性认识材料。新实践是形成新概念唯一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对“新概念”的认识

能否形成新概念是能否形成新学派的关键。科学工作者在反复实践的过程中产生和累积起来的感觉和印象,在一定的条件下,将会在他们的脑子里产生一个认识过程的突变或飞跃,于是产生了概念。概念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不是几个具体的数据,而是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形式,人们借助这种形式认识客观现实的各种事物、现象的一般的,

本质的特征。“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列宁:《哲学笔记》181页,人民出版社,1960)每一门科学在概括客观世界的各种现象时,都运用反映一定范围内的现象的概念。经实践检验的科学概念就是客观真理,它深刻地反映着现实。当然,“人的概念并不是不动的,而是永恒运动的,相互转化的,往返流动的;否则,它们就不能反映活生生的生活。对概念的分析、研究,运用概念的艺术,始终要求研究概念的运动,它们的联系,它们的相互转化。”全部科学史表明,旧概念的被不断修正、补充或否定,概念的转化,新概念的不断形成是科学发展的主要标准和必须攀登的阶梯。没有第一手材料,不行;但仅仅就事论事而不形成概念,亦不行。新概念形成得越多越快意味着这门学科的发展越迅速;反之,很少或没有新概念形成,则标志着这门学科停滞不前。在此,我们可以从中外医学史中举几个典型实例略加说明。

巴甫洛夫关于高级神经活动学说是人们所熟知的。他提出了“条件反射”这个概念。在当时,“反射”是一个旧概念(由巴氏之前的笛卡儿提出),而“条件反射”是一个新概念,它标志着生理学向前推进了一步。从这里开始,巴甫洛夫又根据他自己对大脑半球生理机能的实验研究结果提出了“无条件反射”、“条件反射”、“第一、二信号系统”等新概念;此外,还有“兴奋”、“抑制”、“诱导”、“镶嵌”等新概念。到晚年,他还通过对动物和人的高级神经活动底一般类型的研究提出了“弱型”、“强而不平衡型”、“强而平衡的沉静型”、“强而平衡的活泼型”等新概念。显然,如果巴甫洛夫整天守在实验室里观察狗的唾液分泌与食物、铃声的关系,并加以详尽的客观的记录而不去抽象成“条件反射”等新概念,那么,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是不可能建立和发展的。

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新概念也是不断形成的。例如,“中风”一证,《内经》早有记述,直到明代,张景岳通过自己的实践认识到中风一证并非外感风邪所致,而提出“非风”这一新概念,以正其名(《景岳全书》上册,188页,岳峙楼藏版)。对于暑之为病,张景岳又提出了“阴暑”与“阳暑”的新概念。这种新概念使人们对暑之为病的认识得到了发展。

吴又可可通过长期医疗实践,亲自观察了瘟疫流行的事实,认识到瘟疫病与其他一般外感病在病因、病机等方面的差异,因此明确地提出了“戾气”这一新概

念。他认为“六气”的旧概念已不能概括他所见到的“杂气”的新内容,因此,必须创立新概念,赋予新内容,故提出“戾气”之说(《温疫论·杂气论》)。这个新概念即标志着温热病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类似上述情况在中外医学史中是极为普遍的。从当前中医基本理论研究的进展情况来看,有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不善于根据自己的新实践,突破旧概念,修正甚至废弃旧概念;二是不善于提出确切的新概念。因此,影响了中医基本理论研究工作上的突破。

我们要看到传统中医理论体系中在“概念”问题上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最普遍的问题是一字或一词多义,内涵过多,时而用此义,时而用彼义,往往容易产生混淆。如阴阳二字在中医学中代表的内容不胜枚举,宋元时代,朱丹溪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他所称的“阴阳”首先是指“气血”而言的;其次,“阳”是指心火与相火而言的,“阴”是指“肾精”而言的。丹溪所谓之“阳常有余”是着重指出情欲容易妄动,因而导致相火炽盛而发生病变,并非指人体真阳而言。明代张景岳提出“阳非有余,阴常不足”论。从字面上看二者针锋相对,从张景岳所谓内容而言也是直指朱丹溪的。他在《类经附翼·大宝论》中说得很清楚:“凡阳气不充,则生意不广。故阳惟畏其衰,阴惟畏其盛。非阴能自盛也,阳衰则阴盛矣。凡万物之生由乎阳,万物之死亦由乎阳,非阳能死物也,阳来则生,阳去则死矣。”可见景岳所说的“阳”,乃人身之真阳,并非指心火或相火而言的。因为二人对“阳”的概念及内涵理解不同,所举论证不一,才产生了中医史上有名的“阳有余”和“阳非有余”之争。

再以唐容川《血证论·阴阳水火气血论》为例,说明中医学运用概念之特点。《血证论》说:“人之一身,不外阴阳。而阴阳二字,即是水火。水火二字,即是气血。水即化气,火即化血。”“气与水本属一家,治气即是治水,治水即是治气。”“气为阳,气盛即火盛,血为阴,血虚即是水虚,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如此论述阴阳水火气血之病机及其相互关系,按传统中医理论体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且公认此论是相当精辟的。但阴阳水火气血在词义上之互通若此,的确增加了后学者理解上的困难。这种现象对中医学术思想的传布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因此,如何在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研究阴阳水火气血的客观的微观的物质基础上提出更为确切的特定的概念及其内涵已是当务之急。对比西方医学,这种现象比较少。例如大脑皮质、肾上腺皮质、卵巢皮质、淋巴结皮质等虽都带

“皮质”二字，但在词义上毫不混淆，只需有最起码的解剖学知识即能一目了然地知道名词所指为何物。在西医病理学中，如血栓、血栓形成、栓子、栓塞、梗塞等概念也是毫不混淆的。因为每当病理学家提出一个新概念时即将其内涵与外延明白地确定了下来，他人引用这个概念时也明白地知道其所指何事何物。这是一切现代自然科学所必须遵循的思维方法，是值得人们学习和仿效的。因此，重新审核、澄清、确定并发展传统中医基本理论中某些重要概念将直接关系到中医学术思想的发展、流传和推广。

能不能在自己新实践的基础上积累新材料，发现新规律，提出新概念是能不能发展新理论的重要环节。自从新中国建国以来，广大医务工作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对中医名家学说的探讨；临床上的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中医中药与西医西药同时并举；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医基本理论如阴阳、气血、脏腑、经络本质的探讨；对活血化瘀、清热解毒、扶正培本、通里攻下等治则的研究等，已经累积了不少前人所没有观察到的新材料，这些都是非常可贵的。但遗憾的是能将这些材料上升到新概念水平的报道不多。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1976年，我们从中医临床实践中认识到诊疗病人必须十分重视患者个体体质特征。辨“质”论治是中医诊疗学的精髓之一。因此，提出了体质，体质辨证，体质类型，质化及体质病理学等新概念。体质病理学是西方医学长期以来凭借显微镜观察局部细胞及亚细胞结构所没有能发现，也是从未被深入论述过的发病原理。上述新概念不仅补充了原有中医理论，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些与人类疾病发生发展直接有关的新原理。当然，这些概念是极为肤浅的，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和发展。现能否在研究过程中提出新概念却是一个带有方向性的问题。

创立“新学派”

新学说是科学家用独特的方法对某种现象进行了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材料，从中发现了新规律，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然后创立的新理论。当这种新理论经过人们的反复实践获得了证实，并为人们所公认时，若干相同观点的学者对此新学说作进一步的研究，并加以推广，当发展到一定范围，获得了相当广泛和巩固的基础时便形成新学派。

在中医学史上，温病学派之形成与发展是极好的例证。温病的概念始自《内经》。经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冬不藏精，春必病温”。至仲景《伤寒论》提出了“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此后，刘河间倡“热病只能作热治，不能从寒医”之说。至明代吴又可提出了温病为戾气所致的病原学说。清代叶天士著《温热篇》，首先提出以卫气营血作为温病的辨证体系，并提出了温病传变的总规律，在治疗上创立了一套新方剂和新治则。其后，吴鞠通集温病之大成，并结合自己的治疗经验，著《温病条辨》，倡三焦分证之说，温病学说至此自成体系，形成温病学派。

从以上简要的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出新学派之产生不是神秘莫测的，高不可攀的。古代医家都能在他们自己实践的基础上创立新学说，形成新学派。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条件远较他们优越得多，只要我们自觉地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去研究如此丰富多采的中医学所特有的病因病机学理论，只要持之以恒，通过反复实践和验证，必然能形成新学派。而且新学派很可能不止一个，而是多个。创立新医学派的关键在于要敢于进行新实践，敢于冲破习惯势力，善于提出新概念。

• 消息 •

活血化瘀临床研究学术讨论会在长沙召开

由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活血化瘀专业委员会组织召开的活血化瘀临床研究学术讨论会，于1983年5月6~12日在长沙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代表72名，湖南省列席代表98名。

会议听取了祝谌予等十余位中西医专家有关如何加强及开展活血化瘀研究的学术报告，对活血化瘀的研究方向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成立了活血化瘀治疗心脑血管病、肝炎等重点疾病研究协作组，并拟于近两年内举办活血化瘀研究方法学习班及血小板研究进展学习班。在条件成熟时，举行全国第二次活血化瘀研究学术会议。

(翁维良)